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

新政。變法

翁萬戈 輯

上海遠東出版社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

新政・變法

翁萬戈 輯

 上海遠東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政·變法／翁萬戈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4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1)

ISBN 978-7-5476-0888-3

I. ①新… II. ①翁…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
國—清后期 IV. ①D69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47735 號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

新政·變法

翁萬戈輯

策 劃／徐忠良 責任編輯／徐忠良 劉麗娟 裝幀設計／李 康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

地址：中國上海市欽州南路51號

郵編：200235

網址：www.ydbook.com

發行：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製版：南京前鋪排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刷：崑山亭林印刷責任有限公司

裝訂：上海文藝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889×1194 1/橫16 印張：25.25 插頁：4 字數：202千字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6-0888-3/G·626

定價：200.00元

版權所有 盜版必究(舉報電話：62347733)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零售、郵購電話：021-62347733-8538

《翁同龢文獻叢編》新版序

《翁同龢日記》及《翁同龢文獻叢編》是我高祖翁同龢留下的兩大原始歷史資料。《日記》最全、最確的簡體字排印本在二〇一二年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全八冊；而《文獻叢編》雖在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三年五年間由臺北藝文印書館以影印方式陸續出版，但不易達到全國的讀者。現在上海遠東出版社，在徐忠良先生主持下，將發行新版，我不勝鼓舞，樂為之序。

一、《文獻叢編》六集八冊，其第一集《新政·變法》是為應合常熟翁同龢紀念館在一九九八年紀念戊戌百周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開會時贈送參加的人士首先出版的。其餘五集七冊，大致按其內容與時代列次。為了介紹每集的內容及加深讀者對其瞭解及認識，我敦請了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孔祥吉、故宮博物院朱誠如、山東社會科學院戚其章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王道成四位學識深廣的近代史學家為《文獻叢編》相應各集撰寫序言。他們的思想、評論、意見，已成為《文獻叢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此請讀者特加注意。

二、翁同龢的簡歷、翁氏家藏文獻的形成，我之以玄孫身份繼承遺產，而受到幾代先人的教養，得以保存這些歷史文獻，已見於《緣起》。其中也包括我對各位親友賜助的至誠謝忱，茲不贅述。現在願補充一下個人在救護、保存、整理、發表這份不平凡的遺產時的衷心的感念。我並沒有學歷史，但敢於承此重任，全靠「家教」。四歲入私塾時，老師大概都是前清的舉人或秀才，教授法很單純，就是背書。第一本是《詩經》，第一句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繼之為「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節選的《史記》《漢書》，一直到《古文觀止》中自東周到明末的散文名篇。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本生父親翁之憲（一八九六—一九七二）因職務變動由天津遷到秦皇島。我們三兄弟（大哥開慶，二哥傳慶，我行三，原名興慶）的家庭教師受過新教育，能畫地圖，使我們除傳統的國學外，也略知地理、數學等科目，這也使我們在一九三〇年回到天津後，可以入新式的初中學校。兩位兄長入了北平（即北京）

匯文中學，而我因年幼，留在家中，入了新創的天津公學第一班初中（今耀華中學）。那時的國文教員鄭炳勛（字菊如，一八六七—一九五四）站在我的座位前注視我作文寫字，非常賞識。到了高中一年級，我加入了北平匯文中學大哥、二哥的一班，在教師鄭騫（字因百，一九〇六—一九九一）的訓導下，鑽研文史，同時在圖書館裡大量閱讀『五四』運動後的白話文學，從胡適、魯迅等到巴金、沈從文。到了一九三六年考大學的關頭，除得到保送燕京大學（今并入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外，又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學劉敦楨教授主持的建築系，而父母及過繼的母親強春卿夫人（她的丈夫翁之廉，即我的二伯父，在一九一九年去世前選我為嗣，使我成為翁同龢的玄孫）認為上海離常熟近，我應該試一下當時最難考入的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考畢自查物理、數學兩項——學工程的基本科目，我只各得了六十分，沒有希望被錄取。想不到的是考國文的題目《周易以上古製器物者為聖人論》對我沒有問題，兩小時間我憑空寫了一篇文章，竟得到交大國文系主任陳柱（字柱尊，一八九〇—一九四四）的青睞。他是那時交大校長黎照寰（一八八八—一九六八）的好友，他提出招生的人才主義，把我收入交大。可是這意外的機遇，對我並不完全合適，因為我的興趣不在工程。在交大的兩年，我學習成績猛進，得以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華後，從上海租界乘船赴美，轉入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而且只用了兩年就獲得了碩士學位，然後在紐約擔任了幾個月的工程職務。到一九四〇年底，我決心放棄工程，重回到文學、歷史、美術的領域，而主要服務範圍當然是偉大的祖國。

三、上述是我從事整理家故的基本準備，但另一種同樣重要的學習、修養及經歷是在故鄉常熟的生活體驗。我本生父母同過繼的母親對我的教養有明確的安排，即一切教育到高中畢業，都是跟隨兄長，在天津與北平；只有家庭大事，在我負有『孤哀子』『承重孫』等頭銜的時候，纔回到故鄉，執行典禮。在那些日子裏，我就住在綵衣堂，其大廳仍是明代建築，全部房產是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為孝養母親在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購置的，取老萊子綵衣娛親的故事而名。我依稀記得在只有幾歲的時候，住進了綵衣堂大廳後的房間，而那時常熟仍在『中古時代』，沒有電、自來水、柏油路及一切近代的設備，只有煤油燈、馬桶、井水、拱橋、轎子。大堂的門檻高，幾歲的孩子必

須爬纜能過去。後來回鄉多次後，發現隨着時代的不斷進步，這裡除了水、電、洋車之外，還仍然保持了一些晚清風味，譬如木船。有一次，我陪着過繼的母親（「好娘」）從綵衣堂的後門上船（船分首、尾、中、後艙數部分），由前後兩名船夫撐竿、搖櫓，一直乘行到上海。我睡在中艙的板床上，一夜聽水聲在枕底，其風味至今尚念。又如我十幾歲時，「好娘」爲我雇了一隻小船，整天遊虞山下的西湖，午餐也由船夫供應。每到一個景點，就停船上岸觀賞，使我憶及高祖在他日記中描寫的各洞、岩、寺等名勝……這也是我編輯這部《文獻叢編》的經歷準備。

四、一九四一年尾，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聯合中國向侵略者開戰，我以既有中國方面的知識又具電影的技術獲邀參加美國軍部的特殊電影機構，編製「我們爲何作戰」系列中《中國之戰》一片。影片接近完成時，又被聘爲美國國務院的顧問，利用羅斯福總統緊急款項，特創了譯製美國電影送到戰時陪都重慶，藉以溝通兩國間的瞭解。這項工作持續了三年，而我也自然地變成了留美的華僑。但我不斷地與祖國聯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我仍推進電影事業，而且有機會在紐約結交了美國政府邀請的中國文化界名人——孫瑜、老舍、司徒慧敏、葉淺予、戴愛蓮，而且同後三位合作拍攝了十分鐘的短片《中國民間舞兩種》。之後司徒先生加入了我的小組組織：中國在美電影企業公司。這對我在一九七九年回新中國後的文化活動有莫大的幫助。書歸正傳，對於在美國安全保存翁氏家藏古籍、書畫及文獻的工作，最重要的人物是我已故的老伴程華寶。

五、一九四三年，當我爲美國國務院譯製解說美國情況的電影時，得到資金創作新片，包括拍攝《鎔美鑄華》——介紹中國學生在美留學情況，從晚清的容闈（一八二八—一九二二）到二次大戰期間的同學。此片規模較大，於是我回到自己學習電影技術的紐約哈蒙基金會（Harmon Foundation），請其主持，包括聘用已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分任寫作、攝影等工作。留學生一共三人，包括剛從著名女校布林茂爾（Bryn Mawr）英國文學系畢業的程華寶。她負責搜集資料，接洽被選入內容的機構、人物，以及編寫影片的解說詞，等於做我的第一助手。在天天面談商討的情況下，兩人發生愛情，在一九四四年結婚，婚後仍然是密切合作。日本戰敗後的中國，陷入了國共兩

黨的内戰；我在紐約的企業當時發展相當順利，很難抽身回國，但華寶決心回上海省親，在一九四八年春間携三歲女兒以思乘船先歸，當然我立即追隨，在同年六月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 DC-3 飛機自紐約飛抵上海。拜見華寶父母後，我們三人先謁「好娘」，然後北上天津看望我的本生父母及兄弟、姊妹和侄兒、侄女。馬不停蹄，我同華寶到了北京，拜訪表親王錫桓夫婦，被邀晚餐時，碰到了國民黨自遼寧敗退的兩員軍官，坦陳蔣介石在軍事方面大勢已去。第二天我就同華寶回到天津，將存放在該地長期租房中的「家藏」選擇包裝（由我本生父母及大哥翁開慶大力協助）。安排華寶及以思坐火車回上海後，我帶着「家藏」搭乘開灤礦務局的小運煤船南下，抵滬後將「家藏」都集中於「好娘」在上海所租的「弄堂房子」裡。八月間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造成空前的通貨膨脹。到了十一月，我帶着華寶、以思坐上最後一班由中國飛美國的西北航空公司飛機回到紐約。而「家藏」則在事前安排航運——到達時間的懸殊使我及華寶夜不安寐長達一月之久。終於，十二月十八日得到安全運達紐約的船運公司通知。

六、爲了確保最高等級的安全，我倆立即在紐約出名的儲藏大樓租了一間防濕防火防盜的庫房，將「家藏」保存其中。經過了二十八年，我們決定自紐約遷到美國東北角新漢普沙州（New Hampshire）的小鎮萊姆（Lyme）的一片位於小山半腰的林居中住；自己開闢園地，在一條小溪旁建造房屋，稱「萊溪居」。除珍貴的書畫存入附近的銀行保險箱外，大部分文獻都存放在自己設計、營建的書房畫室中。一九九七年初，得到臺北藝文印書館主持人嚴陳鳳嬌女士的同意，開始《翁同龢文獻叢編》的出版工作，而編輯工作繁重的細節就是把文獻原稿一頁一頁地複印，寄到臺北去設計、印刷。這種極其需要聚精會神地心手相應的工作，都歸了華寶。她在我們自備的大複印機旁，不辭勞瘁地站着一頁一頁地操作，尤其注意那些已經破爛或極脆弱的原件。她的功績不見於這全部《文獻叢編》六集八冊的任何表彰。念及她已在二〇〇三年去世，同我合作近六十年，留下的著作不止於此，我怎能不潸然淚下！

撰寫此序時，不免仰首看到牆上懸挂的高祖所書四扇屏，寫給我本生祖父斌孫的三弟順孫（字寅臣），顯然是大字的訓言，節錄如下：

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海外亦粗有經籍……姪孫應熟看前後漢史、韓柳文。

壬辰夏五爲寅臣姪孫 瓶叟（時合一八九二年六月）

我們家傳的歷史感，就是我編輯出版這部《文獻叢編》的動力。

翁萬戈寫於萊溪居

二〇一四年一月，時年九十五歲又半

緣起

在十九世紀入後幾十年中，以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鴉片戰爭為歷史上的分水嶺，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急劇地走下坡路，每況愈下地陷入了甲午戰爭（一八九四）的莫大危機，使有頭腦有熱血的朝野人士認清了只有變法圖強，纔可以免於亡國之禍。在這種極其艱難的環境中，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從一甲一名進士出身到兩任帝師，歷官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參與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安危的重大決策，終於在戊戌變法的前夕，被開缺回籍，結束了四十二年的從政事業。身為晚清政局的中樞分子之一，他鞠躬盡瘁地設法保全國土，改變頹局，但崩潰的大勢遠勝於革新的志願和努力。這位近代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終不能免為突出的悲劇性人物。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教材分經、史、子、集四大類，而史是骨幹：經裡不能無史，子、集更不能脫離史。翁氏精通史學，而且以史為教授皇帝的主要工具。他深深體會歷史的意義，所以一生記錄極勤：最特出的是他的日記——自咸豐八年戊午六月二十一日（一八五八·七·三十一）到光緒三十年甲辰五月十四日（一九〇四·六·二十七），幾乎整四十六年，包括了他整個從政時期及罷黜後的六年，在他逝世前六天纔絕筆。這部第一手歷史資料在乙丑年（一九二五）由張元濟先生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七三年據此縮印），在一九七〇年臺北趙中孚先生曾編輯此日記的排印本，後來北京中華書局陳義傑先生又點校新的排印本，陸續出版。在中法越戰期間，他受命初次入軍機，加寫《軍機處日記》：起自光緒九年二月初一日（一八八三·三·九），訖於次年三月十一日（一八八四·四·六）；在一九三八年由收藏者燕京大學圖書館影印出版。其實，除這兩部日記（一大一小）之外，他還留下了大量的文獻：隨手記、奏稿、議摺、信件、輿圖及他經手負責的他人奏摺、說帖等等。這些若非他的手迹，就是他過目的文件，總之，都是第一手資料，值得近代史學者的探索與參考。不過這些文獻分散在各處，近百年來損失的數量也必可觀。除去已歸公有的圖

書館、博物館及檔案館的那些資料之外，恐怕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翁氏家藏』的這一組。而這裡所謂『翁氏家藏』的範圍，需作下述的解釋。

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又號瓶生及瓶廬，晚年常用松禪，諡文恭，所以他的著作、書畫在出版時，常標『翁文恭公』『翁松禪』或『松禪老人』。他的父親翁心存字二銘，號邃菴，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爲同治帝師，卒諡文端。長子翁同書（即翁同龢長兄），字祖庚，號藥房，官至安徽巡撫，卒諡文勤。次子翁音保，早卒。三子翁同爵，字玉甫，官至湖北巡撫。翁同龢最幼，無子，由同爵子曾翰嗣；曾翰的長子安孫又無子，由同書的曾孫之廉嗣；之廉無子，由同書的玄孫興慶嗣——而我就是興慶，自號萬戈。因此，我的本生世系是高祖同書，曾祖曾文，祖斌孫，父之憲；而族譜上的世系是高祖同龢，曾祖曾翰，祖父安孫，父之廉。在中國的社會制度下，我繼承了松禪老人的遺產，包括故鄉常熟、翁氏故居綵衣堂（在一九九〇年捐獻常熟市人民政府後改爲翁同龢紀念館）、古籍、書畫，以及前面所述的文獻。我生於一九一八年，而次年我過繼的父親之廉，即我的二伯父就去世了，這些『紙頭紙腦』的遺產就一直保存在我過繼的母親（即我的二伯母）在天津長期租用的房子裡。但她主要住在常熟綵衣堂，其中仍有不少文物。自一九三七年日本發起全面侵略戰爭以後，我們到上海租界避難，綵衣堂就不再是住宅；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它被改爲傷兵醫院，其後又經過『文革』，堂內所藏的什物與資料基本上毀散無存。我在一九三八年從上海交通大學轉到美國普渡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育電影工作，一九四八年重返故國，在天津初次檢點由松禪老人傳到我的這一部分古籍、書畫及文獻，裝箱運上海，然後在接近年終混亂的局面下，由海運到了美國。這批文獻基本上就是本叢編所指的『翁氏家藏』，可以說是狹義的『翁氏家藏』。

在此必須提起另一組翁氏家藏的翁氏文獻，一向保存在我本生高祖同書一支的家裡，其原來的數量相當可觀。尤其是因爲祖父斌孫是松禪老人得意的侄孫，所以他得到不少珍貴的松禪手稿及資料。一九五〇年父親翁之憲將北京圖書館趙萬里、高熙曾兩先生所選的家藏善本悉數捐獻，其中也有很多翁心存、翁同書及翁同龢撰寫、編輯及批注的文獻和稿件，例如翁心存撰《知止齋遺集》二十二種稿本，共一百十一

冊，及翁同龢輯撰的《瓶廬叢稿》二十六種稿本，共三十冊。那時我大哥開慶侍父在場，他還記得父親談及常熟綵衣堂夾壁中尚有藏書，可能幸免兵燹；趙先生當即前往搜尋，聽說有所收穫，也歸入北京圖書館。這些當然已不在現在「翁氏家藏」範圍之內。至於父親留下的少數祖先遺迹，又受到「文革」時的抄掠破壞。即使如此，還有一些歸還到開慶兄及永慶、銘慶兩弟手中，如殘存的《松禪年譜》（自訂）及松禪老人寫給斌孫的很多封信。這一部分「翁氏家藏」的殘餘，在適當的地方可能也用在本書編之內——自然要標明目前的藏主。

現在要談到整理「翁氏家藏」翁同龢文獻的過程。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這三十年中，我在紐約一家最安全的儲藏庫裏租了一間小儲藏室，安置這些久存天津的先人遺物。然後我決意脫離城市，在美國東北角的新漢普沙州一個萊姆小鎮的山間自己設計建造屋舍；小溪映帶，因稱「萊溪居」，而基層全部是藏書及工作之所，具備了展開文獻從事整理的條件。一九七九年在去國三十一年後初次有機會重返故土，在天津和北京與闊別的開慶兄、永慶及銘慶兩弟歡聚，在常熟又踏上了綵衣堂的門檻。回憶我兒時一直受本生父母的教養，在私塾與開慶大哥（長我三歲）、傳慶二哥（已故）同學，到了北京匯文中學高中又同學三年，時常一同工作，於是提議請大哥大嫂到萊溪居小住數月。第一次在一九八一年，我們開始整理家故的工作，但進展不多；第二次在一九八九年，努力完成了總目錄；而主要的是在第二次一九九六年，從六月起，大哥差不多每天都翻閱、檢點、分檔，而且有些比較重要的項目，他把稿本的行草書「譯」成正楷。這樣持續了約六個月。所以這叢編的基本整理工作，是開慶大哥的功績。

關於編印本叢編的構想，我懷之已久，但總達不到成形的地步。一九九四年五月下旬，常熟市政府和中國史學會聯合主辦了「甲午戰爭與翁同龢學術討論會」，以紀念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百周年及翁同龢去世九十周年。我在會場上發表一短篇《翁氏家藏文獻述略》，報告截至該時這組歷史資料部分公開發表的情況和日後規劃進行的工作綱要。這個可以簡括為下列三條：

（一）供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利用，以書及雜誌的方式發表，例如謝俊美

教授的專著《翁同龢傳》；

(二) 以影印方式將原稿整理成集後陸續出版，這是繼先父經手影印《翁文恭公日記》《瓶廬叢稿》等之後的工作，以供學者研究；

(三) 以專著的方式編印《翁同龢書畫集》《翁同龢所收古代書畫集》《翁同龢所收古籍善本目錄》等。

顯然，本叢編就是上述第二條的具體實現。

綜觀全體資料，大致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從政方面，一是個人及家族方面。而本叢編只限於前者，把後者留待異日處理。再分下去，從政方面的資料可列為六集：

- 一、考試及國子監
- 二、內政·宮廷
- 三、中法越南問題
- 四、甲午戰爭
- 五、中德、俄、英交涉
- 六、新政·變法

從這六集的標題，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半是應付列強的侵略壓迫，而最後一集則達到變法圖強的覺醒。明年是戊戌變法的百周年，所以首先編印《新政·變法》這一集，以資紀念。其他各集，當陸續出版；因每集的內容有其獨立性，所以并不一定按照以上的次序與讀者相見。我去國將近六十年，學識有限，幸得許多益友之助，纔能擔起這件工作；可是錯誤難免，敬希賢達指教，以備在日後改正。

最後，我特別感謝下述幾位對我的鼓勵與幫助：家兄翁開慶的整理標目，是完成叢編的基礎工作，我在前面簡略談過。他在萊溪居時孜孜不倦，日復一日，我們一齊研究、探索，恍如童年及少年時代同窗之樂。雖然多半時間我們遠隔太平洋，但在頻繁的書信中，也不斷商討這些整理家故的事項。可以說，這部叢編是我們兄弟合作的

成果。其次是中國近代史學家孔祥吉先生，他對戊戌維新運動有專著，目前被邀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從事專題研究，使我有機會時常請教。《新政·變法》的資料編排得到他的改正，同時又蒙他賜以長篇前言，談及這些文獻的重要性，使積塵百年的舊紙，充滿了適於古為今用的生活力。然而，像本叢編這種題材比較專，規模又相當廣的文稿，很難引起出版家的興趣。藝文印書館有此見識魄力，毅然接受，這不得不歸功於該館主持人嚴陳鳳嬌女士——嚴一萍夫人。我的故友嚴一萍先生既是甲骨學專家，又是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企業家。他在一九五二年創辦藝文印書館，所印《百部叢書集成》，是中文圖書館必備的重要參考資料。我有幸在一九六八年得識嚴先生，合作影印我家藏的《宋刊施顧注蘇東坡詩》；結交以來使我深佩他以學者精神來發展文化事業的志願及成就。他在十年前逝世後，嚴夫人繼其遺志，同樣地為學者服務；今春我們在臺北商談本叢編的計劃，她明快地分析綱要及細節，提出具體進行方式，毫不遲疑地擔起了出版的責任。我既欣愉又欽佩，在此謹申由衷的謝忱。

一九九七年秋葉將紅時翁萬戈誌於菜溪居

價值連城的歷史文獻——寫在《翁同龢文獻叢編》出版之前

孔祥吉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神州大地硝烟瀰漫，國共兩黨的軍事爭奪，正處於白熱化的決戰階段，京津局勢尤為緊張。這時一位在美國留學就業將滿十年的青年回國省親，將其高祖遺留下來的手澤，傳給他個人的，統統裝入行囊，由天津而滬上，不辭辛苦，歷盡艱辛，終於將這一批經由幾代人保管的家藏文獻，運到了大洋彼岸，在美國妥加保存。這位當時的年輕學子，就是如今已八旬的知名學者、愛國華僑翁萬戈先生；他所精心保存，使其免遭兵燹的珍貴文獻，就是即將由台北藝文印書館陸續刊出的《翁同龢文獻叢編》。

早在一九八九年我來到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未久，就接到萬戈先生的熱情邀約，要我到他所住的萊溪居去閱讀翁氏家藏文獻，這對我來說，真是如魚得水。幾年來，這些歷史文獻深深地吸引了我，利用它們結合我在紫禁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鈔錄的清宮檔案文獻，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今年七月，當我剛結束柏林大學的訪問，返回波士頓不久，就收到萬戈先生寄來的《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 新政·變法》。翻閱之後，真是喜出望外。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真是一批價值連城的歷史文獻，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關於翁同龢其人

翁氏文獻之所以可貴，是與翁同龢本人在晚清政壇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密切相關的。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字聲甫，號叔平，江蘇常熟人，出身於世宦之家，父兄皆為朝廷重臣。他於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高中狀元，仕途一帆風順，先後擔任過刑、工、戶諸部尚書，兩度出任軍機大臣，並曾於甲午戰爭後，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於他飽讀經史，嫻熟詩文，人品端方，故曾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奉命在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帝；又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再入毓慶宮，充當光緒帝師傅長達二十年。

之久。時人稱其爲『兩朝帝師，十載樞臣』^①，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尤其是在光緒皇帝親政之後，翁同龢對晚清政局之影響，達到了頂峰。翁氏於日記中曾直言不諱地寫道：『廷臣』每遞一摺，上必問臣可否？蓋眷倚極重，恨臣才略太短，無以仰贊也』。正是因爲翁氏在清廷的這種無人取代的重要地位，才使這批文獻變得無比珍貴。

收入本集的文獻，大多是從光緒帝親政前夕（即光緒十四年），至翁氏被開缺離開京師（即光緒二十四年），十年間的原始檔案。這段時間是中國由傳統的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變化最激烈的十年，也是對大清王朝的命運，或者說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至關重要、存亡絕續的十年。

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步步進逼，翁同龢被搞得筋疲力盡，焦頭爛額。嚴酷的現實不斷地給翁氏敲響警鐘，使他覺悟到：無論是靠自己的滿腹經綸、廉潔奉公，還是靠自己的學生——光緒皇帝的兢兢業業、勵精圖治，都無法使清王朝擺脫任人宰割、瓜分豆剖的悲慘處境。於是，這位位極人臣、老謀深算的帝師走了一着險棋——向維新派靠攏，更張舊法，走向西方學習的道路。這是翁同龢在列強欺辱，國勢凌夷的情況下所產生的新認識，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新轉折。在當時的袞袞諸公中，能像翁同龢這樣，從國家和民族的大局出發，拋棄傳統舊觀念，起用『以開創之勢治天下』的人才，實在是爲數不多的。儘管他在試用西法的道路上還有些左搖右擺，患得患失，但比起那些貪圖一己之私利，抱着傳統舊法死死不放的頑固派來，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翁同龢因爲引薦康有爲，推動變法事業而遭到慈禧、榮祿等滿族權貴的忌恨，最後丟掉了烏紗帽，落得一個由地方官『嚴加管束』的可悲結局，但是他却贏得了包括康有爲、梁啟超等著名改革家在內的許多人的尊重。今天，我們研讀翁氏家藏文獻，必須要瞭解當時新舊交訖、門戶日深的複雜朝局和翁氏本人爲宗社擔憂、不斷求新的思想特色，纔能融會貫通，掌握這些歷史文獻的真諦。

〔一〕 惲毓鼎：《澄齋日記》，北京大學圖書館存稿本第五函。

珍貴的《上清帝第一書》摘鈔本

翁氏文獻這一編的主題是新政與變法，因此本書輯錄了與戊戌維新關係十分密切的文獻資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一書》鈔錄本。該書又稱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呈。這是康有為於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十月首次向清廷進言。這位晚清的改革家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罔知忌諱」，「干冒宸嚴」，無情揭露清廷國事敗壞，內政不修，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變法綱領，并要求仿照漢朝議郎，設立訓政之官。因此，康氏此摺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而康氏此摺與翁同龢關係十分密切。他通過國子監祭酒盛昱呈遞給翁同龢，指望通過翁氏之推薦，打開通向清朝權力中樞的道路。如果翁氏當時採納康有為的建議，推動清廷變法，那麼中國的維新運動至少提早十年，其結果也會與戊戌的百日維新大不相同。可惜翁同龢沒有這樣做。康有為大失所望，憤憤不平地離開京師。他在《己丑上書不達出都》一詩中吟道：「海水夜嘯黑風獵，杜鵑啼血秋山裂。虎豹爭守九關，帝閭沈沈叫不得。」^{〔一〕}反映了康有為壯志未酬無可奈何的心情。

為什麼翁氏沒有將康氏《第一書》向清廷進呈？據《康南海自編年譜》記曰：

值祖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萬言書，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朝士大攻之。十月遞與祭酒盛伯義先生昱，祭酒素元直，許上之。時翁常熟管監，以文中有言及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以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時張佩綸獲罪，無人敢言，常熟恐以此獲罪，保護之，不敢上。^{〔二〕}

康有為解說的原因是否真實？史學界頗有爭議。黃彰健先生對康氏之說即不予采信。而當事人翁同龢在其日記中記載，亦過於簡約，翁氏僅謂：

盛伯義以康祖詒封事一件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祇生覺

〔一〕 崔斯哲編：《南海先生詩集》，卷二。

〔二〕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四冊，第一二〇頁。

耳，決計覆謝之。^{〔一〕}

翁氏究竟為何未代遞康摺，在《文獻叢編》中有十分確切的答案。翁氏不惜花費很多氣力，將康氏《第一書》詳細摘鈔，並於該摺前面批注道：

南海布衣康祖詒，擬上封事，由成均代遞，同鄉官無結，未遞。其人初稱布衣，繼稱蔭監，乃康國器之侄孫也。^{〔二〕}

由此可見翁氏未遞《第一書》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康氏上書，沒有取得同鄉京官的印結，與清代上書體制不合，故翁氏不願冒違制風險代遞一份易遭非議的上書。康氏初自稱布衣，又改稱蔭監，前後矛盾，亦增加翁氏疑慮。當然，翁氏當時思想尚趨守舊，對新法之認識，也不像日後那樣清楚迫切，故使康有為的變法願望未能實現。據康氏記載：六七年之後，翁同龢還就此事向其道歉，謂：『常熟謝戊子不代上書事，謂當時實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慚云。』^{〔三〕}可知翁氏雖未代遞《第一書》，但對康氏之建議却是刮目相看。否則，他不會在為數眾多的上書中，對康氏《第一書》詳加摘鈔了。

非但如此，由於翁氏文獻中發現了康有為《第一書》的摘鈔本，從而為考證此摺的真偽與其內容的更改提供了可信的證據。

據翦伯贊先生在《戊戌變法書目解題》一文中稱：

南海先生遺稿一冊，民國十年影印本。是書係影印康有為光緒十四年第一上書原稿，并附沈曾植批改原迹。與外間所傳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內容稍有不同。^{〔四〕}

其實，民國十年刊布的手迹，顯然不是光緒十四年康氏向清廷呈遞之原件。用翁氏摘鈔本來校刊，可以清楚看出，坊間流行的康氏《第一書》，內容可靠真實，并無重大差異。雖然如此，也不排除康氏曾不斷地對《第一書》進行修改潤刪。文中更改處甚多，現僅舉一例：坊間流行刊本在論述慎聲色之防時謂：

〔一〕《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二〕翁同龢：《政事雜鈔》，見《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以下凡引此書者不再注明。
〔三〕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四冊，第一三二頁。
〔四〕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四冊，附錄。